

1945 年到 1960 年前关于大陆迁港难民的分析

任砚泽¹

摘要

1945 年到 1960 年这一时段中国大陆经历了重要的历史变革，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由于香港地理位置背靠大陆，大量的战争难民涌入香港。难民包含了资本家、知识分子、官员、平民等各个阶层。他们的到来为香港战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力，并且知识分子还对香港中文教育以及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50 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导致许多知识分子遭受磨难，又因自然灾害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大量难民偷渡潜逃至香港。此时段的香港在港英政府治下采取了对难民相对宽容的政策，由此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冷战的背景下，香港成为了美国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美国向香港提供物资援助，帮助香港吸纳更多难民。调景岭难民营是此时段难民聚集地，港英政府派遣官员管理同时又给予难民营高度自主权，在“双十暴动”后，港英政府修订政策，淡化难民的界限感，让难民融入香港居民生活。总的来看，1945 年到 1960 年期间的大陆难民中，有些人将香港作为跳板移民海外，而大量的难民选择定居香港。尽管在多方势力干预下难民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随着他们积极融入香港社会，为香港 60、70 年代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大陆难民、香港、国共内战、政治运动、国际社会

I. 导言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扼海上交通要衢，而有其适宜之地理环境與人文伟迹故也²”。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被英国人占据。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1898 年随着瓜分狂潮的进行，清政府又将新界租借给英国，至此香港全境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统治时期，因此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二战中日本攻占香港，香港经历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日本战败后，香港又回到了英国统治下，

在此期间内中国大陆经历了近四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又称“解放战争”）。随着国民党军在战场逐渐失势，大批商人资本家、学者、作家、军人等移民香港，他们为香港战后的腾飞带来了丰厚的资金、技术与劳动力，推动了香港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50 年代先后进行了“四清”、“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和经济政策的变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50 年代是大陆政治运动最集中的时期，在此阶段大量的大陆难民被迫迁至香港，大陆将这一时期称为“逃港潮”。在此期间香港也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的“阵地”，国民党试图通过逃港难民将香港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而中共方面也在积极领导香港左派势力开展群众运动。随着冷战的进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也加强干预香港的难民事务，将香港作为扼制苏联势力重要板块。50年代因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到来的难民虽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抵港移民难以相提并论，但这些移民为香港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同样的由于大量难民到来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³

在本文中关于“难民”的定义采用了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联合国在1967年1月31日在纽约修订的关于难民身份的《难民议定书》，上述文件规定难民为：“基于一种可以证明成立的理由，由于种族、宗教、国籍、身为某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畏惧遭受迫害并留身在其本国之外，并由于这样的畏惧而不能或不愿意受该国保护的人。”⁴现阶段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多是侧重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大陆逃至香港的难民状况的研究，以及关于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难民的研究，而将重点放在二战后至60年代前这一时段大陆迁港难民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因为战争迁港的大陆难民及50年代因为多次政治运动和生活条件等原因迁往香港的大陆难民，与文革期间迁港的大陆难民在阶级构成、政治背景、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微观差异，并且此时段国际社会、香港政府和国共双方在此阶段对于迁港大陆难民关注程度很高。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1945年至1960年前迁港难民对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政府、国际社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采取的措施。

II.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迁港移民

1. 时代背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双方签署《双十协定》，约定避免武装冲突，争取和平建国等共识，在1946年1月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然而

双方在最核心的军队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重庆谈判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和平。蒋介石在此期间向东北、华北大量运送军队，而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训练军队，进行土地改革并扩展解放区。1946年国民党军队开展全面进攻，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战争的前期国民党军处于进攻态势，而随着1947年共产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始，共产党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锦沈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平津战役（平津会战）相继开战，由于因国军在战略上“先图关外，再安关内”之故，国军精锐部队开入东北，辽西战役使国军部队在东北被共军击溃，也造成关内的国重空虚，无法有效对付关内共军⁵，以至于在军事上遭遇溃败。在1949年初“三大战役”宣告结束，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1949年4月渡江战役展开，南京解放，随后不久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第二次国共内战基本结束。

此时大量的国民政府官员、军人、资本家和文化界人士等选择流亡海外，由于紧靠中国大陆地理位置，香港成为了重要的大陆难民聚集地。在二战后初期，港英政府并没有对中国大陆居民入境香港有太多限制，然而随着在1948年后战局的变化和大陆形势动荡不安，据统计两年间涌入香港的难民数量超过40万人，给香港社会带来巨大压力。港英政府在1949年实行了入境配额制度，加强了对大陆难民入境的管制，尽管政策在收紧，但仍有大量的偷渡难民从大陆逃至香港。时任总督葛量洪回忆道：“我们在1950年五月才开始限制内地人来到香港，这样做并非为了防止共产党渗透，而是难民实在太多了。”⁶

2. “内战难民”在香港

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进行，受战争影响以及对战后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许多

大陆难民在 40 年代末期来到香港。这一时段迁港难民主要由资本家、官员、文人等构成，这些难民对 50 年代及以后香港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在战场的节节败退，许多生活上海和南京的资本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慌，纷纷选择移民香港。上海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来自上海的资本大量涌入香港，“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去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 1/2 以上。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与外资能分庭抗礼的力量”⁷。这一时期大量的移民带来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大量的劳动力，这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开始香港逐渐取代上海成为了亚洲新的金融中心。

迁港的知识分子难民中不乏文化名人与学者如钱穆，未来的史学家而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余英时等，大多数人来到香港的目的是将它作为一个避难所，在此来观局势的变化从而决定未来的走向，也有一些人是长期定居在香港，而他们的到来为香港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因此笔者将其称为“知识难民”。在 50 年代在香港发展的“知识难民”推动了香港中文教育的勃兴。“当时受政府认可的大学只有以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南来学者只能自己创立高等院校，如新亚书院和崇基学院等，去继续其教育事业”⁸，钱穆、唐君毅等学者牵头创办的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共同成为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此时到来的作家以及抗战时期来到香港的作家通常被称为“南来文人”，他们创办了许多民间文化组织与学校，对于香港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们在六十年代前的香港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对香港文人有着重要影响。⁹此

时难民文学在香港兴起，成为了反共的“绿背文学”，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更早一点逃到香港难民营的台湾作家邱永汉，却在小说《香港》中表明台湾并非反共小说所憧憬的自由世界，显现出国民党外来政权与台湾本土派矛盾的另一个维度”¹⁰。知识分子还积极创办报刊，“友联出版社”作为这时期的代表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书籍和刊物，《中国学生周报》影响了一大批此时的青年学生，“知识难民”群体对 50 年代香港中文教育的推广意义深远。

一些国民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没有撤离到台湾，他们定居香港并开展“反共”工作，扶植右翼势力，而台湾方面也将香港视为反共基地，和反攻大陆的跳板。也有一些官员从香港辗转其他国家，如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便没有随蒋介石撤到台湾，而是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并去往美国，最后回到中国大陆。此时期具有政治理想的“知识难民”也在香港进行政治宣传，在美国与李宗仁的支持下，以顾孟余为首的“第三势力”成立，他们不从属于国共任何一方，通过创办杂志宣传民主自由的思想，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左舜生创办的《自由阵线》。并且他们积极组织政治活动，由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勱、前行政院副院长顾孟余，和张发奎将军于一九五二年创立并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¹¹然而随着港英政府加强了对政治活动的管制，美国在冷战中政策逐渐倒向偏国民党一方，以及“第三势力”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国共之间的第三种选择终归于泡影”¹²

III.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迁港难民

1. 时代背景

经历了 14 年抗日战争以及近四年的解放战争，此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民政府在撤退台湾时带走了大量的资金、科学家以及珍贵文物，致使在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后在开展国家建设时缺少必要的物质、科技条件。

大陆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经济建设。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给百姓耕种，此举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3年-1957年，进行了“一五计划”，重工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国防军事能力大大加强，国民经济复苏。在政治层面在中共八大之前也取得了显著成就，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召开，颁布了“五四宪法”。1953-1956年，中国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在国际地位上，1950-1953的“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入朝作战，迫使美国与中国和朝鲜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议》，通过“抗美援朝”（韩战）中国让世界认识到了其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提高了国际地位。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参与处理“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后，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影响力甚至远至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本人在此时都对未来形势充满了信心，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随后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做出了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这一举措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创。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交恶，导致国民经济更加困难。在这一时期广东省有大量的难民逃难来到香港，构成了这一时期香港移民的主力。

在政治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

义的初级阶段。”¹³在1957年先后掀起在“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并且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在数量上错划和受株连的面很宽，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99%都是错划的；被错划的同志受到严重的打击，轻则党纪、行政处分，重则判刑劳改。¹⁴因此在这一期间内有许多被划为“右派”的只是分子、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以及对自己前途命运担忧的人选择偷渡来港，此类人是这一时期移居香港的经济和文化层次更高的人群。

2. 港府的难民政策以及民间团体做出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有大量的大陆人偷渡来到香港，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逃港”时期。逃港的主要人群以距离最近的广东为主力军，还有一些江浙、四川、福建甚至可以远至天津等北方地区的人群。由于国民政府将香港视为“反攻大陆”的战略要地，因此也有许多国民党方面的军人和特务潜入香港，暗地里组织反共活动。台湾方面为了做军事上的准备，积极对外宣称，大陆的难民可以通过香港中转进入台湾，以吸收可以扩充军队的有生力量。但是国民党方面将香港的调景岭作为“反共”活动据点，让许多来自大陆的亲国民党人士在此聚集开展宣传活动，并且台湾方面由于经济、政治、人口等原因大幅减少接受难民数量，因此许多准备去往台湾的难民被迫长久地移居香港。

香港作为重要的难民聚集地，承载着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亚洲许多地区的难民。港府最开始并没有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最初以为难民会短暂停留后就会去往第三方国家，“因为我们错误估计，以为当中国新政权稳固时，而一切正常后，他们便会返回故里”¹⁵。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其中的许多难民选择主动定居在香港，并且寻找机会将自己在大陆的亲人带到香港，不仅有难民，还有他们后来带来的“新移民”。并且他们在香港结婚生子，这就造成香港人口的剧增，有

数据统计,在 1946-1953 年间,由于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人口总数从原有的约 60 万人增至 236 万人”¹⁶。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住房、医疗、治安、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1950 年 6 月,香港政府决定在调景岭地区设置难民营,用来安置大陆难民。在营内设置“香港政府社会局调景岭营办事处”,1958 年改为“社会福利署”,主管社会福利与救济工作。¹⁷调景岭在当时位于新界西贡,与香港岛隔海相望,香港岛当时已经成为香港的经济中心而调景岭还并未得到太多开发,有较为充足的空间用于安置难民。港英政府在调景岭难民营修建了大型厨房、引水设施、厕所、学校、诊所、理发室等设施保障难民基本生活需要,并且设置了组织机构,主任为难民营的领导,下辖副主任以及多名干事共同负责营内的管理工作。由于官方派驻的管理人员有限,在管理人员的领导下,难民营中也组建起民间自治团体,负责卫生、治安、维持秩序等营内日常工作。在此阶段有义工自愿参加营内的基础工作,累计超过了 400 人次,工作时长通常超过 8 个小时,并且他们可以获得一顿免费的工作午餐。¹⁸由于当时香港经济还处于战后的恢复阶段,对于难民营的物质投入比较有限,教会团体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为难民生活带去福利,他们带来的大量的生活、医疗物资,缓解了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的物资紧张问题。

1956 年的“双十暴动”则体现出“难民”为社会政治带来的冲击。¹⁹在十月十日这天,恰逢“中华民国国庆”,移居香港的亲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在居住地楼外大量悬挂“青天白日旗”,而由于当时香港政府规定安置区楼宇外禁止张贴旗帜,工作人员撕掉两面旗帜由此引发冲突成为“双十暴动”导火索。大量人群聚集示威,与政府警察防暴人员形成对峙,由于当地黑帮组织介入进行打杂抢烧的破坏活动,与警方产生激烈冲突,直到驻港英军部队介入事件才逐渐平息,暴动造成了超过三百人的伤亡。香港政府不得不就现实情况

采取一些措施,1955 年至 1956 年,港府待“中国难民”的态度出现重大变化,开始提出整合“难民”至本地社会的理念。²⁰此后“难民”一词大大减少了出现频率,这表明港府有意识的将“难民”与本地居民相融合,模糊他们的界限,促进社会稳定。“难民”也在香港政府的政策倡导下,积极融入社区,寻找工作机会争取实现自力更生。到了 1950 年代后期,调景岭难民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并且脱了港府的控制。²¹

这一时期在港府的倡导下,许多民间团体在解决“难民”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商总会是香港民间重要的华商团体,前身是 1896 年成立的中华会馆与 1900 年成立了华商公局,²²而成立后的两个组织并没有立即合并,或是由前者改组为后者,二者时常单独组织活动,冯华川同时担任两个团体主席²³。随着香港经济地位逐渐取代上海,成为亚洲第一商埠,1952 年华商总会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改革,更名为“中华总商会”,这一称呼沿用至今。这一时期香港经济的发展为长期安置“难民”提供资金,而快速工业化亦有助于把“难民”引入本地劳动市场²⁴。中华总商会的成员有许多为工厂的经营者,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他们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难民”也为香港的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华总商会针对难民问题积极捐款捐物,组织公益活动,动员商户筹集善款与物资用于难民安置工作和医疗、教育保障。并且动用商业资源,积极从外地向香港调运粮食,保障基本民生,为港府应对难民问题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华总商会等民间团体的积极奔走下,形成了既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又有利于解决“难民”生计问题的双赢局面。

3. 国际社会态度

二战后英国综合国力大为衰落,对于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已经无力全部控制,在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反殖民运动活跃,英国政

府无力镇压，因此不得不撤出以上地区。而香港作为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对经济影响巨大，英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并且考虑到维持在华以及东南亚的利益，对于香港的政策调整显得极为重要。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近尾声，英国政府预见到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即将崩溃，大量国民政府官员来到香港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香港“左翼势力”团体活动也越发频繁。在难民问题中，左右翼势力的较量也影响着英国政府的态度和难民问题的走向。

左派团体在香港的活动引起港英政府的忧虑。时任总督葛量洪决定打击左派势力，港英政府镇压左派报纸，葛量洪对此的解释是“第一，左派报纸渐渐开始挑战港英政府的权威；第二，左派报刊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第三，左派报纸的报道会对其他香港的报纸产生影响，他们也会和左派报纸一样批评港英政府”²⁵。右派势力由此在“难民”中的影响力加强，大量的右派分子进入“调景岭难民营”，台湾方面更是将香港视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在香港大范围开展宣传与援助。美国政府方面，出于美苏冷战的需要，对香港的干预逐渐加强。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利用香港作为对大陆进行宣传和渗透。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在 50 年代创办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在香港成立分会，作为中美民间合作组织，为大陆难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生活物资，并且帮助他们前往西方国家。²⁶并且美国通过加大对香港居民的福利以及对香港的物资供应，拉开香港居民与大陆居民的生活差距，利用香港向大陆展示西方的优质生活方式。²⁷这一政策收获了一定的效果，根据一些从大陆偷渡来到香港的难民口述，他们来到香港的信念就是为了“牛扒”。

香港在 50 年代的难民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调查人员考察到香港惊人的“难民”人数，以及艰难地现实情况，

“有超过一百多个当地的和国际志愿组织开始加入救援，为其提供食物、衣物、暂居地、医疗服务，以及教育和就业训练等”²⁸。由于香港此时的“难民”中有许多人是国民党的军政界人物，他们在香港常组织右派活动，台湾当局经常从中作梗。1957 年以来，相当数量的大陆人通过各种途径流入香港，这给香港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的好机会，故有意给港英当局提供经费，以增加香港安置中国大陆流民的能力”²⁹。而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在香港的利益，对待香港民间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中立的态度，跟新中国政权尽力保持表面的“友好”，从而难以大力干预香港的难民问题。时任港督葛量洪多次前往伦敦，要求对香港难民问题提供援助，但伦敦方面认为从根本上此时英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完全控制香港事务，香港的战略地位大为降低，仅仅起到作为维护英国国际形象的作用，因此不想因香港难民问题而增加过多的财政开支。

IV. 结语

二战结束后的 40 年代中叶和 50 年代，香港逐渐成为了远东地区难民聚集中心。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党军的失利和 50 年代大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致使许多人被迫迁居香港。这些移民带来的资金与技术为香港的腾飞奠定了经济基础，许多“南来文人”对香港文坛影响深远，左右翼文人在港激烈交锋。同时来到香港还有许多国民党军人与政客，他们的到来让香港右翼势力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庞大，与此同时中共也派遣人员来到香港开展工作，然而在多方因素促使下，港英政府加大了对左派团体的打压。50 年代冷战视域下的香港也成为了多方势力争夺利益的要地，“知识难民”为香港文化、教育事业影响深远，随之兴起的“第三势力”运动也曾经风起云涌，但最终在美国、台湾和

香港政府的外部压力与自身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也宣告破产。美国干预香港事务，计划通过对香港的援助来增加难民容纳量，并借此制造混乱向中国政府施压，这大大增加了香港政治的复杂性。

大量以及人口带来的难民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一时期港英政府、民间团体、国际社会都针对香港难民问题积极谋划与奔走，最终使得“难民”逐渐融入香港本土社会，并且“难民”为香港提供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助推了香港经济的繁荣。1960年“世界难民年”到来，为香港解决难民问题提供了许多机遇，难民的处境大为改善。二战后至六十年代前香港的移民，及其带来问题的逐步解决，为香港日后在60年代后成为“亚洲四小龙”奠定基础。

注释

- 1 工作单位：香港城市大学。
- 2 罗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载罗香林等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国学社，1959年），香港档案馆藏，页1。
- 3 陈肖英.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4.
- 4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联合国大会.1951年7月28日.
- 5 颜鸿隆（2014）.《国共内战国军军事失利之研究》.（硕士论文。国立中央大学）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https://hdl.handle.net/11296/acg5b6>.
- 6 葛量洪著,曾景安译.《葛量洪回忆录》（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页180-182。
- 7 唐涯.<极简香港经济史[J]>.《中国中小企业》，2015(06):64-69.
- 8 容启聪.综论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识难民.台湾人权学刊,6卷1期,页87-93,2021-6-1
- 9 廖伟棠,<莫问南来意——香港新移民中的南来文人>.凤凰网,2011-7-18.<https://news.ifeng.com/c/7fa0ZuJIKCJ>
- 10 赵稀方,<五十年代香港的难民小说>[J].《甘肃社会科学》，2014(03):11-15.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4.03.010.
- 11 容启聪.综论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识难民.

- 台湾人权学刊,6卷1期,页87-93,2021-6-1
- 12 黄克武.顾孟余与香港第三势力的兴衰(1949-1953).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一六二期,2017-8.
- 13 石仲泉、薛钰、高远戎,<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14 王素莉,刘志光,<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06):117-127.
- 15 葛量洪著,曾景安译.《葛量洪回忆录》（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页199-200。
- 16 Mark, C.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 17 陈勃等编,《香港调景岭难民营调查报告—为响应世界难民作(1959-1960)》，页21。
- 18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调景岭营《营报》创刊号文摘>，收录于《张寒松先生访谈录》，胡春惠主访，《香港调景岭营的诞生与消失—张寒松等先生访谈录》，页275-276，摘引自黄耀忠，《从救济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国难民政策”，香港：三联出版社，2020，页37。
- 19 黄耀忠，《从救济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国难民政策”，香港：三联出版社，2020，页101。
- 20 黄耀忠，《从救济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国难民政策”，页98。
- 21 黄耀忠，《从救济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国难民政策”，页108。
- 22 周佳荣、钟宝贤、黄文江撰《香港中华总商会百年史》（香港：香港中华总商会，2002-7），香港档案馆藏，页1。
- 23 <华商公局告白>（壬寅年四月十九日），载1902年6月《香港华字日报》。
- 24 黄耀忠，《从救济到融合·香港政府的“中国难民政策”，页104。
- 25 龚向东.1949年前后英国的香港政策研究[D].南京大学,2019.DOI:10.27235/d.cnki.gnjju.2019.001774.
- 26 中美民间合作中心, 新庄“周以德村”.台湾民声日报,1954-10-21.
- 27 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J].历史研究,1997,(03):52-65.
- 28 游洲,<冷战视域下的香港“难民”问题探讨(1949-1960)>[J].《武夷学院学报》,2017,36(07):53-57.DOI:10.14155/j.cnki.35-1293/g4.2017.07.011.
- 29 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J].历史研究,1997,(03):52-65.